

第二辑

*Oral History for NGOs in China No. 2*

# 中国NGO口述史

王名/主编



本书的被访者包括郑卫宁、任旭平、谢玲丽、吴青、吴登明、李宝珍、张开宁和陈金罗。这本书，是八位作者的人生史，也是他们所代表的NGO的创业史。我和我的团队，只是用口述史的方法，力求忠实地再现每一位作者的人生故事及其NGO的创业历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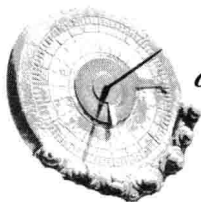
THE  
2014  
ANNUAL REPORT



# NGOISE

2014

NGOISE 2014 ANNUAL REPORT  
THE 2014 ANNUAL REPORT  
OF THE  
NGOISE  
2014



*Oral History for NGOs in China No. 2*

第二辑

# 中国NGO口述史

---

王 名/主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 NGO 口述史. 第 2 辑 / 王名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 - 7 - 5097 - 6485 - 5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非政府组织 - 名人 - 访问记 -  
中国 IV. ①K825.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6856 号

## 中国 NGO 口述史 (第二辑)

---

主 编 / 王 名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刘骁军

责任编辑 / 李娟娟 关晶焱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http://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378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6485 - 5

定 价 / 68.00 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序 言

中国 NGO 口述史，是记录中国 NGO 与公民社会创业者们口述历史的著作。本书是继 2012 年出版第一辑后的第二辑，收录了我们近期完成的对八位被访者的口述访谈。

中国 NGO 的创业者们，是一群用梦想改变社会、用行动书写历史的公民。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已届高龄，有的甚至已不幸仙逝。他们曾拥有的梦想、曾采取的行动，是中国公民社会中最富有生命力和先驱性的历史记录，是以公民个人为主体展现的中国 NGO 的创业史。如何记下和展示这一段留在当事人记忆中的历史？这是口述史研究的真正价值和使命之所在。在一定意义上，我称之为中国 NGO 研究的“抢救工程”，这一研究有着强烈的时代感和紧迫性。

清华大学 NGO 研究所从 2005 年开始组建口述史研究团队，采用欧美流行的口述史研究方法，探索对中国 NGO 创业者们进行口述历史的调研、访谈和笔录整理。2012 年，我们在多年探索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中国 NGO 口述史》第一辑，收录了 20 位被访者的口述访谈。尽管水平有限，篇幅也不大，但我们耗时多年，耗力巨大，可谓滴水穿石，终成正果。出版后社会反响很大，常有读者来信来电询问，网评也颇好。这不仅肯定了我们既往多年的工作，更给了我们很大的激励。我于是下定决心，将这项意义深远的工作坚持下去，且不断改进提高。

本书的被访者包括郑卫宁、任旭平、谢玲丽、吴青、吴登明、李宝珍、张开宁和陈金罗。这本书，是八位被访者的人生史，也是他们所代表的 NGO 的创业史。我和我的团队，只是用口述史的方法，力求忠实地再现每一位被访者的人生故事及其 NGO 的创业历史。

本书在方法上突出口述史的人生史价值。作为 NGO 研究者，我们在对象选择上，当然首先关注的是被访者所代表的 NGO 及其成长史。但在

研究中我们益发注意到：作为 NGO 的创业者，他们把自己的人生几乎完全融入其所开创的事业中，用全部生命在书写 NGO 的创业史。这一代 NGO 创业者的人生史，无疑就是活着的 NGO 创业史。人生史中有个人的成长与挫折，有内心的坚韧与彷徨，有得有失，有乐有忧，有面对大潮的迎接，有出淤泥而不染，还有精神的回归，灵性的涌现，等等。这无疑将放大我们口述史研究的范围和难度。我们本着学习的态度，边学边做，翻阅了大量有关人生史的著作，努力调整访谈的计划，努力和被访者沟通交流，也尝试着形成我们自己的风格。我还将 2013 年参加 IDEAS 培训学到的“U 型理论”用到我们的口述史研究中，尽量放下，学会聆听，回归内心，体验当下的自然流现。这是我们透过人生史的视角和新的方法探索 NGO 口述史研究的第一步，尽管肤浅粗糙，但不失为一个有益的原型（prototype）。坚持下去，我们相信，终有完善的那一天。

本书的统稿因与作者联系反馈等事宜，从上一年暑期延至寒假，又至第二个暑假。其间我在给博士生开设的一门课上尝试用口述史方法做了一个实习，同学们建议选择新生代的公益领袖作为访谈对象，竟有了意想不到的惊人收获。大家一致同意，在访谈基础上进行整理，争取在今年出版一个新的口述史特辑，相信会更加精彩。

新的一年已过半。原计划在去年出版的这本书，无奈之间拖到了今年。2014 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一年，以社会治理创新为主题的社会领域的改革正在全面展开。我们中国 NGO 口述史的研究也进入收获的一年，除本书外，还有两本也将陆续出版。我再三思量，还是没能为新的专辑找到一个合适的名称，只好沿用首辑的名称。我知道这样会增加读者选择和阅读的困难，但面对被访者，面对中国 NGO 创业者的创业史和人生史，我深感所负的担子很重很重。除了对读者诸君说一声抱歉，我还只能说：这是中国 NGO 口述史的第二部分，故名第二辑。我会继续努力，直至将来。

王 名

2014 年 7 月 13 日

于四川飞往北京的航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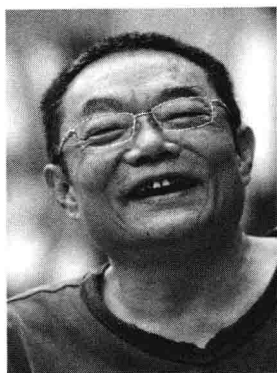


# 目 录

## CONTENTS

- 一 郑卫宁 谈残友集团 / 001
- 二 任旭平 谈兔王集团 / 079
- 三 谢玲丽 谈领导力 / 118
- 四 吴 青 谈“农家女”及人生史 / 148
- 五 吴登明 谈重庆绿联 / 181
- 六 李宝珍 谈向阳中心 / 237
- 七 张开宁 谈云南健康研究会 / 291
- 八 陈金罗 闲谈结社法起草 / 314
- 结 语 / 340

## 一 郑卫宁 谈残友集团



郑卫宁先生



访谈郑卫宁先生

### 访谈题记

郑卫宁先生，1955年出生于辽宁大连，1971年移居湖北武汉，1997年于深圳创立“残友”。他虽出身高干家庭，但命运多舛。因患





先天重症血友病，他生下来就不能走路，童年时期只能依靠双手爬行；青年时期遭遇“文化大革命”，父母受迫害入狱，他跟随外祖母四处流浪，十年未获输血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从未进过学校，却在27岁考入湖北电大，用九年时间连续拿下了中文、法律、企业管理三个电大文凭。母亲病逝后，三次自杀未遂的他开始重新感悟生命，42岁那年用母亲留给他的30万元现金、一栋房子、一辆面包车带着其他四位残疾人踏上了互联网创业之路；在他的公司步入正轨后，他却通过律师公证将全部股份捐赠给社会，并且将他一手打造的“残友”和“郑卫宁”等驰名商标品牌一同捐赠。他先后荣获“中华慈善楷模”“全国自强模范”“全国劳动模范”等光荣称号，并五次受到胡锦涛同志的接见。在“残友”内部，“郑大哥”已经成为支持每一个残疾人奋进拼搏的精神支柱……

残友集团，登记注册名为“深圳市残友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英文为“Can you”，意思是“你能，你可以”，是为残疾人打造的高科技就业平台。在郑卫宁先生的领导下，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残友集团已经发展为拥有1家基金会、11家社会组织、33家高科技福利企业、近5000名员工的世界级规模集团公司。残友集团以“越是残疾，越要美丽”为奋斗口号，以“残疾只是特征，知识就是力量，就业构建和谐，科技创造效益”为发展理念，以实现“弱势群体依靠高科技强势集中就业”为伟大构想，以“推广残疾人实现自我价值有尊严的快乐生活方式”为核心使命，号召“全世界残疾人团结起来，用行动改变自己的命运”，为当代社会发展探索出一条成功的公益与科技发展有机结合的高效之路，亦构筑起中国公益慈善事业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线。

我们对郑先生曾进行过多次访谈，第一次是在深圳残友的总部，我与他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交流；第二次是在他来北京出差期间，我与他有过短暂的会晤；第三次是我的一位博士后杨丽到深圳调研时对他进行的访谈；最近一次是我与研究团队专程到深圳残友总部拜访他，这次访谈时间最长。在两天的口述史访谈过程中，我们团队的每一个人都深深地为郑先生的高尚品格和执着的精神所感染，我们非常急切地希望将他的思想、故事和经验立刻呈现给每一位读者。这也愈发使我们感觉到口述史研究所肩负的使命。在此，我们对郑先生深表敬意，更感谢他对我们工作的理解和大力支持。



## 1. 两个“郑卫宁”

问：我一直把您看作两个不同的人，一个是我面前的、真实的郑卫宁，一个是灵性的、作为精神的郑卫宁，您自己怎么看？

答：我觉得你说得特别深刻。我常常回忆，自己小时候正逢“文化大革命”，书籍很有限，我又没上过学，所以抓着什么读什么。当时法国雕塑家罗丹雕的巴尔扎克给我内心的震撼很大，那是对巴尔扎克破烂不堪的肉体和隐藏在那个躯壳里面的精神的一种颤动，所以说，你说到我心里去了。

问：您是在什么时候觉得有两个不同的“郑卫宁”？

答：我从小患先天血友病，生下来就不能走路，13岁之前，又接触不到辅具，就那么在地上爬，一生也没进过校门，这是很让人自卑的。再加上自己的身体，每天就是出血、输血、抢救，这样的一个人，肯定不会被自己的精神认可的，所以说就我这样的特殊情况来讲，可能很早就有这样的感觉。

问：您十几岁的时候就有？

答：对。

问：您实际上意识到了有一种分裂？

答：对。我跟所有的媒体都没有谈到自己的童年。而实际上，我自己的成长过程、我的童年对我这一生的影响非常大。但我们这个群体有很多是比较弱的，比如残障社工是提供社会服务的，他需要有非常强大的思想和心灵才能做好心理咨询，才能做好社工的工作。但我们在培养残障社工的时候，最开始是感性的发现，发现残疾人特别弱，不像在设计软件和动漫方面，他比健全人强，通过电脑屏幕，他只要有耐心很快就会超过健全人。残疾人做社会服务工作就是不行，即便在我们这么着力培养的情况下，即便背后有几千个大学生残疾人团队的支撑，我们11个社会组织的残障社工也占不了整个社工比例的20%。溯根求源，因为从小残疾以后，家庭不论贫富，一定对他呵护有加，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在中国过去的老式家庭里，一般的男孩女孩其童年的成长很被忽视，要不就给挂个钥匙，要不就让隔代的老人带，然后有啥就吃点啥，都是跟着老人过日子，都是自己管自己。所以他们到大学毕业以后的家庭生活、



宿舍生活、组织生活、形成的人格和残疾人是完全不同的。残疾人的心灵从小就被呵护，他跟主流社会那些心灵强大的人缺少交流，也没参与过广泛的社会竞争，他有很大的自我。像我们说的心中有个大大的我，做什么事都要关注外界怎么看自己，自己会怎么样，不像一般的主流社会的青年们，到哪儿求职到哪儿打拼，进去就是拼，没有想到自我的那套东西。

问：在精神上，您跟他们不同？

答：是的。我自己有这样一个体会，我在精神上不认同我是血友病群体的一员。比如我到各地去，都不参加血友病患者的聚会。血友病患者有五十多岁、六十多岁的，也有十几岁的，他们的聚会我不参加。我根本就不认同我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血友病患者是残疾人这个人群当中最孱弱的群体。举个例子，你去参加他的聚会，如果是长沙发，你坐下来的话，他就说，慢一点别碰到他，因为他一碰就出血，旁边坐一个人，他都害怕无意当中会碰到他的胳膊和腿。他们的精神状况也非常的弱，觉得能维持着不出血就行，走到哪儿都不敢动，哪像我拄一跟拐棍全国各地到处跑，这种精神状态完全不同。所以血友病患者的聚会我不去，但我可以赞助。七年前在深圳开血友病大会的时候，我从国外的血友病组织那里要了三大箱药，通过海关进来。大会上几百个人，我给每个人发了六瓶，一千多块钱一瓶。即便我全自费，我也愿意去帮助他们，但是我不去开这个会，我不愿意跟他们坐在一起。从他们的家属到他们本人，弥漫的那种悲观，那种保护的气氛是不行的。

## 2. 少年回忆

问：您童年正逢“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对您人生的影响大吗？它与您的这种分裂是否有联系？

答：别人看起来“文化大革命”给我带来的影响是灾难性的，让我一天学都没有上过，但我特别感恩“文化大革命”。仔细回忆，可能造就我这一生这样的性格，主要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也就七八岁，但是“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记忆犹新，我觉得主要原因是我们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我的父母都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我母亲是地方的局级，而我的父亲是军级，他是部队里的将军，但他是在一个院校里，就是现在的武汉海军工程大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院校属于“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单位。父亲



被打成叛徒关了十年，母亲也被关了将近四年，也就是说有三到四年，家里面什么都没有。当时组织上每个月给未成年的孩子 22 块钱，但是我们那个地方政策执行得不好，我父亲被关的十年当中，这 22 块钱从来就没发给过我。

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答：是的。家里翻天覆地的变化总让我想到鲁迅。鲁迅的爷爷本来是江浙一带主管科举的官员，很显赫，他的父亲也是个公子。但到了鲁迅六七岁的时候，爷爷在考场帮同乡作弊，被光绪帝发现，下了御旨，家被抄了。在鲁迅的杂文中有讲他家被抄了以后，父亲就得了肝硬化死了，母亲含辛茹苦地带着他们一家，他的童年完全就是在一个从显赫的位置突然败落下来的家庭里度过的。所以鲁迅曾说，哪一个人要是在童年到青年的成长过程中，正好碰到了家道衰败，那他就可以非常清醒地认识社会，鲁迅说这样的人就有福了，我觉得套用到我的身上也是一样。

我父亲当年的部队在大连，我们家当时在大连有一栋西式别墅，在中山区 77 街 73 号，是 77 街所有别墅中最漂亮的一栋，前院后院一应俱全。当年父亲被抓之后，第一步，家里的每一件家具都被没收了，只剩下草垫，于是我就把草垫铺在地上睡觉；第二步，那些造反派结婚没房子，那个时候流行给造反派奖励房子，于是我们家的房子就被疯抢。我印象特别深，来一堆戴红袖标的造反派，他们找了一间朝阳、面积最大的房间，告诉我明天要从那个房间搬出去。然后我们就搬出来了，造反派就住了进去，在那举行婚礼。就这样慢慢抢，一个楼最后抢的只剩下一间房留给了我们。父母都被抓，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作为知识青年全部下放，就只剩下我和姥姥住一间房。我跟我姥姥在那个地方也没办法生存，我母亲和父亲的老家都在山东农村，后来我们就回山东了。

问：一直没上学？

答：是的。实际上深究起来，这“文化大革命”十年没进校园乃至后来也不能上学，不是因为我的身体状况，而是因为政治动乱。政治动乱当中我又面临另一个生死考验，就是血友病患者容易出血，那就必须用输血止住，如果不止住，血就会无限地出，你能看到这种花纹吗？

问：花纹？

答：这种花纹叫妊娠纹，妇女怀孕的时候把皮肤的纤维撑断裂了就形成这种花纹。因为我是“狗崽子”，“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去医院的权利，我出血的时候就没有血输，所以每次出血的地方肿得比头都大。现在

的血友病患者没有这种花纹。我所有的皮肤、所有的关节全都是妊娠纹，因为我每一次出血就经历生死，活下来完全靠运气。就像这个腿一样，出血，它使劲地出、使劲地出，最后怎么止血？物理上皮肤再也撑不动了，就像杀猪以后吹那个猪膀胱一样，吹到最大，吹不动了，有物理的压力，这个血就止住了，这个过程非常痛苦。肿起来以后除了把皮肤撑出妊娠纹，还会把关节撑脱臼，我只能躺着不能动，一动就痛，要 15 天才能够消肿。消肿的时候有一种生理现象叫吸收热，也就是发烧，那时候是真的生不如死。每个关节，一年 365 天，可能有一半时间是不痛的，不说能不能走，就是坐在那儿不痛都已经算奢望，另外的一半时间就是往里面出血。结果我还特别幸运，我这十年全是关节和肌肉出血，没有出现肾出血和脑出血，这类情况血友病患者是常有的，当时有那么一场出血，我就没命了。我母亲姐妹三个，每个人都生了一个血友病的儿子，他们两个一个脑出血，一个肺出血，咯血就死了。所以也是机缘巧合，上帝这么眷顾我，只是让我的关节不停地出血，尽管受罪。现在我都带着癌症病人用的吗啡，随时出血随时用。

问：现在用吗啡止痛？

答：对，靠吗啡止痛。深圳有 300 多个癌症病人，我是唯一非癌症享用者。医生诊断我的全身关节腔都因为出血被破坏了，我一活动的时候就会痛，他说我活得要有尊严，不能每天活在疼痛当中，就给我破例，每个星期发给我规定数量的吗啡。

问：“文化大革命”让您经历了痛苦与生死，但您也收获很多？

答：对。我自己总结过，正好是八岁到十八岁，这十年的痛苦磨难，给了我几样东西。第一个就是无比坚强的意志，你上次来我没拄拐杖，最近走不动路了就拄上了。我到北京、上海出差，走不动路用拐杖也能走。在这个地方上班，每天跟着员工吃大食堂，我吃得最香，大家都说大哥怎么会这样，实际上我觉得从生死线上挣扎过来以后，这个人的意志是特别重要的。还有就是好多人问，我做“残友”的 15 年里，没在银行贷过款，也没找人借过款，也没领过政府补助，一定走得非常不易。我没觉得，因为我觉得童年都是那么走过来的，接下来，只要每天活着，每天哪里都不痛，我觉得就是最好的状态了。其他的那些压力什么的，对我来讲，不值一提。所以我觉得这是童年给我的第一个影响，我具备了特别强大的内心。

第二个就是家庭环境。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比我大好多，“文





化大革命”当中，我才十来岁，他们全下放了。家里本来在部队上，没多少书，“文化大革命”之前，哥哥姐姐借了无数的书回来。“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抢家里的东西，但他们不抢书，书堆得到处都是。正好我这十年每天躺在床上，就靠书来解闷，那个时候觉得要有个电子管的收音机就好了，可以每天听一听。那实际上就是禁锢在这个房间里面生活，但在这种生活当中，我全部用来看书，解决了我不能上学的缺憾。这种学习过程是很有意思的，最开始十个字里面只认识两个，有八个不认识，然后就把它当符号记，也不会发音，慢慢地，我就通过看书看懂了。最后发生了件挺有意思的事，我在1982年上第一个电大的时候，我的第一篇论文是优秀，写的是湖北新军武昌起义跟知识传播的关系，算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论文。虽然我在病床上练出一手好字，但是那个“春天”的“春”字下面是一横还是两横，只是大概有个印象，一到写论文的时候，要写正楷，就难免写错。老师们虽然给了我论文优秀，但也帮我指出了论文中的400多个错别字，他们也很奇怪怎么会有这么多错别字，我告诉他们我没有受过小学、中学和高中的基础训练。这个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个影响。

第三个就是对社会和人生的清醒认识。小时候我不能行走，当时又没有轮椅，就买了那种小孩的三轮车，遇到部队院校里演电影或者是演出，家人就把我抱到三轮车上，拉我出去玩玩。随着年龄的增长，三轮车不能用了，家里人都被抓了，只剩下一个年迈的外祖母，她根本抱不动我，所以就干脆不出门了。“文化大革命”还没开始的时候，我父亲是院校里的领导，我坐在小三轮车上去看电影，大家谁碰到了都夸我，“哎呀，这孩子真聪明，这孩子真可爱”。父亲被抓了之后，一夜之间众叛亲离。我记得姥姥最后一次带我到部队的澡堂洗澡，因为在北方没有在家洗澡的习惯，都是在澡堂洗，她抱不动我，只能拖着，当时就那么艰难地拖着我在父亲的大院里走，没有一个人过来帮忙，老人家拖不动了就歇一会儿，谁都不敢帮把手，包括碰到过去熟悉的，大家全都是扭过脸去。这次以后，我再也不去洗澡了。还有，我父亲的警卫员是一个湖南人，他之前跟我们家就像一家人似的，结果“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反戈一击。我在后期已经完全体弱得要死掉，送到医院去后，正好跟他住一个房间，结果那个房间出现了“反标”。“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草木皆兵，在哪里有人用毛笔或者粉笔写点什么字，就有人研究说这个东西是“反标”，那就是“反标”。

问：“反标”的意思是？

答：反动标语。“文化大革命”的“反标”很可怕，有人说这是个反动标语就立刻报案，报案以后过来拍照，接着就开始审讯。我们那个病房里有十二个病号，有的已经出院了，当时可能有点墨水，有人就在病床上写了个打倒刘少奇，然后画了个小人。那个时候到处是这样的标语。再有病号住进来就再往上加字，可能这个同房间还有一个姓王的和一个姓李的，他就加个李王，意思是打倒刘少奇也打倒你们两个，就是开玩笑的意思。后来我父亲的警卫员在病房里发现了这个“反标”，研究研究就去报案了，他说当时海军的首长叫李作鹏、王红昆、张秀川，号称“李王张”，代表毛主席路线。他说那个“反标”写着打倒刘少奇，旁边带个李王，是代表李作鹏首长。报案以后，旁边的保卫科还有工宣队都来了，尤其这个工宣队是最让人害怕的。

问：工宣队是工人宣传队的简称？

答：对，就是工厂里的师傅组成的队伍叫工人宣传队，也就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文化大革命”有两派互相打，清华北大都有工宣队，打打打，最后把学校的领导都打倒了，然后工宣队进入学校进行管理。当时就是工人阶级革命最好，但他们真的是大老粗管理，简直好笑得不得了。

当时就是工宣队来接手这个案子，我父亲的警卫员第一个就揭发。这里面唯一对“文化大革命”有仇恨的，就是我。我当时才13岁，还不会写字，工宣队就审问我，通宵不让我睡，但他们不敢打我，因为一打我就要出血。虽然免了这个皮肉之苦，但其他所有的折磨全上了，十几个人轮番轰炸，我被吓得直哭。他们就说小孩别哭，承认了就没事，就可以走了，但那确实不是我写的。这就是父亲的警卫员。

再说保健医生，保健医生跟我们家关系特别好。当时我完全不能走路，有时候站一站，脚也出血。我的姥姥在路上碰到保健医生的夫人，就悄悄跟她讲，我已经站不起来了，能不能帮我搞两块海绵，给我垫到鞋里，站起来的时候，脚就不那么挨着地了。保健医生的夫人就给我弄了两块海绵，装到一个信封里，来给我们的时候是怎么给呢？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被赶到了筒子楼里，当时大家都在做饭，她不敢进去，进去怕别人说没和我们划清界限，搞阴谋诡计。于是她就“哐当”一下把门推开，大声训斥说：“你姥姥在家吗？”我说不在，她去街道参加劳动去了。她看看没人，把信封扔地上，就走了，就到那个程度。我觉得“文化大革命”让我对这个社会，对人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另外让我增加了许多危机感和





警惕感，觉得这个人际关系非常的复杂，所以从小就非常注意周围人是怎么想的，环境是怎么样的。这些能力对日后做企业也好，带领团队也好，起了关键的作用。

问：所以您很感恩“文化大革命”？

答：是的。总之，我的经历当中，“文化大革命”是意志的锻炼。如果高尔基说社会是他的大学的话，那对我来讲，“文化大革命”不只是一所大学了，而是我一生的学校，从意志力到所有的东西。还有就是，“文化大革命”锻炼了我的胆量，因为从小看到了太多不应该看到的事。第一类事就是我父亲被抓。造反派们都把“造反”进行得很“革命”，我们家当时就是一个小楼，其实敲门就可以进去，结果他非得半夜从墙上翻过来，打破了窗户冲进去抓。我身体不好，我姥姥在一个大床上陪着我睡，他们打破的窗户就在我和我姥姥睡的房间。一帮人进来后把我父亲五花大绑，扔到卡车上，然后再反复地抄家。我还记得我父母被关后，姥姥给我们家带来过一个灾难。一个毛主席石膏像被打破了，她不知道如何处理。她不敢拿出去倒，怕被人揪住了不得了，就包了一个纸包，放到一个纸箱子里收起来，结果造反派抄家的时候，把这个翻了出来。一看这个毛主席像被打破了，还放在个纸袋里，就认为这是罪证，说我们仇恨毛主席，在做诅咒仪式。于是现场就审问姥姥和我，折腾了七个小时。

第二类事是，我住的医院是大连海军医院，由于我是“狗崽子”，所以给我的病房是个最大的。这个病房平均每周都会有自杀的人进来，就是我父亲那个院校里自杀的。当年国民党有个“重庆号”起义<sup>①</sup>，中央军委问哪一支部队离那里最近，我父亲是四野的一个团政委，带着那个团正好走到那儿，上边命令他赶快接收“重庆号”，就这么把“重庆号”给接收过来。接收下来后就地转为海军，没再随四野继续打，就变成了海军学校，所以他是海军的创始人之一。那些“重庆号”起义过的人，都在我父亲的院校里面当教官。因为他们是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的，“文化大革命”时，他们首当其冲被批斗。“重庆号”的很多人都是在我在的那个病房里自杀的，我都记得他们每个人死前的惨状。

有两个事特别刺激我。有一个广东人，我记得那个时候他讲一口广东话，他跳楼没自杀成。因为不自觉地手先着地，接着头着地，手和脑盖全

---

<sup>①</sup> 1949年2月25日凌晨，国民党政府“重庆号”官兵在舰长邓兆祥的带领下，于上海吴淞口外举行了起义，将军舰开往解放区烟台。



部骨折，骨折以后，就被送到病房里。造反派每天还来训斥他，抢救期间也是如此。结果他找邻病房的一个病人家属借了把剪刀，正好脑盖都没了，他就把自己的脑子搅乱然后死掉了。还有一个是我父亲院校里的一个电工，八级，是最高级别的电工，“文化大革命”时被人叫作反动“把头”<sup>①</sup>，被关起来打，他受不了打，想要自杀；但看管得太紧，连裤腰带都被收走了，他就在吃饭的时候，把两根筷子放在鼻孔上，然后使劲地压下去，两根筷子直插到脑子里。但他当时没死，落了个脑炎，在我那个病房里，熬了一个多月才死。他老婆带着才七岁的孩子过来照顾他的时候，因为是“反动”家属，还要打扫整个医院的卫生，护士进来的时候，对他的换药和对他老婆的非人道，我到现在还记得。

所以在我小的时候，对于“文化大革命”当中非理性、暴力的这些东西，我见的特别多，这也锻炼了我的抗打击力。那个时候，透过医院的窗户，我只要看到用担架抬着跑过来的，就知道上面躺着的是自杀的，然后送进了抢救室，过一会儿就扔到我的病房了。所以说“文化大革命”给了我很多东西，当然它也彻底破坏了我的身体。医生对我说，一个血友病人，怎么会破坏得这么严重？我就告诉他，我十年没输过血。医生说，不可能吧，血友病人如果十年没输血早就死了。我说我就这么凑巧，活下来了。所以从八岁到十八岁的这十年，对我来说是一个非人的环境，尤其是后期去了武汉，我都差点死掉。

问：什么时候去的武汉？

答：我们是1971年去的武汉。因为去了武汉之后，我能见到父亲。他跟他们的政委、院长等十来个人都被关了起来，他偶尔回家拿衣服，都要有两个专案组的人跟着。他们要参加劳动，我就会经常看到他在院子里扫院子。还有那个时候，部队到哪儿都种麦子，他去晒麦子，我也可以看到他。那段时间，我经历过一次大出血，记不清楚是十六岁还是十七岁的时候。当时姥姥因为癌症，去了北京我姨那里，就我自己在家，腹股沟出血，这是血友病非常危险的情况。我自己也没办法照顾自己，就找来一个部队发的小床，就是当中一个板、两边两个床架子那种床。我把床上挂蚊帐用的四个竹竿给拆下来，拿毛巾把它们扎起来，扎起来之后，就放在两个床头那儿弄住，因为这个腹股沟出血是不能躺的，我就趴在竹竿上。

问：持续了多长时间？

<sup>①</sup> 把头是广东一带对旧社会中把持某种行业从中剥削的人的称呼。